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期末報告

城市徵狀：精神分析式的建築閱讀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101-2410-H-343-024-
執行期間：101年08月01日至102年07月31日
執行單位：南華大學建築與景觀學系

計畫主持人：郭建慧

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郭俊賢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蔡孟軒

公開資訊：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102年10月18日

中文摘要： 本文藉由對當代臺南市進行精神分析式的建築閱讀，企圖關注作為物之集聚的臺南城市中，透過建築所表徵的精神品質。現代城市是人類文明進程中一個全新性質的生活環境，生活於其中的居民因此具有不同的精神品質，另一方面，城市居民面對現代城市的生活環境與傳統生活環境間的文化斷裂狀況，在精神上也受到衝擊，因而具有各種抗拒、順應、畏懼等反應，本文所要關注的就是上述肇因於現代生活的精神品質，如何反映在建築之上。因此，本文以拉岡的精神分析觀點，將臺南城市中的建築視為一種徵狀，它們表達出與城市居民身上類似的精神品質，藉由對本文所提出的代表性建築：對臺南州廳與孔廟所作的分析，本文描述與讀解了肇因於日治時期「近代化創傷」，並在臺南城市中全面開展的建築徵狀：蔓延於城市中的建築復古手段，以及近年來在城市中盛行的對古蹟、歷史建築的突顯工程；由臺南州廳與孔廟所象徵的臺南傷口中，探索傳統與現代間斷裂之處隱而不顯的意義，由此，在結論為臺南城市提出聚焦於其精神品質的整體詮釋。

中文關鍵詞： 建築徵狀，精神分析，創傷

英文摘要：

英文關鍵詞：

建築徵狀：精神分析式的建築閱讀

摘要：

本文藉由對當代臺南市進行精神分析式的建築閱讀，企圖關注作為物之集聚的臺南城市中，透過建築所表徵的精神品質。現代城市是人類文明進程中一個全新性質的生活環境，生活於其中的居民因此具有不同的精神品質，另一方面，城市居民面對現代城市的生活環境與傳統生活環境間的文化斷裂狀況，在精神上也受到衝擊，因而具有各種抗拒、順應、畏懼等反應，本文所要關注的就是上述肇因於現代生活的精神品質，如何反映在建築之上。因此，本文以拉岡的精神分析觀點，將臺南城市中的建築視為一種徵狀，它們表達出與城市居民身上類似的精神品質，藉由對本文所提出的代表性建築：對臺南州廳與孔廟所作的分析，本文描述與讀解了肇因於日治時期「近代化創傷」，並在臺南城市中全面開展的建築徵狀：蔓延於城市中的建築復古手段，以及近年來在城市中盛行的對古蹟、歷史建築的突顯工程；由臺南州廳與孔廟所象徵的臺南傷口中，探索傳統與現代間斷裂之處隱而不顯的意義，由此，在結論為臺南城市提出聚焦於其精神品質的整體詮釋。

一、現代城市的精神品質

現代城市相較於傳統城市，有不同的規模、人口密度、承載著相較於以往更加複雜的人事物，如果視其為物質之集聚的話，那麼透過建築所表現出的文化背景仍是龐雜異常。換言之，如果說現代城市是一個發自近代的新文化現象，那麼它就是一個生活環境的新類型，與近代以前的生活環境，具有截然不同的環境品質，以及生活經驗，而關於其所造成的獨特精神品質，也成為許多學者在對城市的書寫中所涉及或關注的焦點。

現代性的始祖波特萊爾，就是在城市中汲取他思想的養分，班雅明說：「波特萊爾的詩擔負著一種使命。他發現了一個空曠地帶，並用自己的詩填補了他」(班雅明，2010：202)，波特萊爾創造了一種「建立在震驚根基上的現代抒情詩」(陳學明，1999：186)。城市自 19 世紀以來吸引了詩人、作家的注目，工業、商品、傳統、人群匯聚於城市中。大眾深陷雜處、異化、緊密而同時離散的被動焦慮。波特萊爾意識到自身所處的時代已經無法再被傳統抒情詩所取悅，他藉由在城市中對現代性進行窺探，而洞察傳統抒情詩的困頓，由此它呈現了現代城市不同於傳統鄉村的性質。班雅明從波特萊爾那裏，發展出他對城市的觀點，敘述了一種令人「震驚」(shocker)的城市環境，他自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中發展「震驚」論述，他認為「震驚」是人們對應都市「經歷」的反應，他對於震驚的論述可詮釋為兩種心理學層面上的涵意：

「其一是外部突發，強大能量對心靈的刺激，即意識保護層防禦機制對此刺激的抑制、緩衝時獲得的瞬間經歷或者說瞬間體驗；其二是人們過去經驗無法對外部世界巨量材料適應與同化，二者產生斷裂時心理經歷或者說心理體驗」(陳學明，1999：190)

現代都市中的不連貫性、片斷化、破碎化導致感官間的衝突。當人們無法以過去經驗回應外部世界時，便意味著經驗的喪失，人格的分裂，甚或是社會價值的瓦解。

班雅明認為，現代城市處在「經驗匱乏」的狀態之中，經驗是建立在傳統根基上的意識的積累，傳統經驗建立了意識的完整性。「震驚」則是透過強烈的外部能量刺激意識的保衛機制，並在過程中使意識獲得一種瞬間經歷，或是使經驗無法與外部世界同化而斷裂。班雅明認為傳統經驗所積累的不只是對實質事物的記憶，同時也是潛意識材料的匯聚。依照班雅明對震驚的心理學詮釋，他將傳統積累的「非意願記憶」(完整意識)歸類為「經驗」(Erfahrung)，屬於傳統社會與前工業時代的範疇；而意識的自我防衛機制對抗外部刺激(震驚)所造成的緩衝則是「經歷」(Erlebnis)，經歷能夠讓某一事件在意識中建立確切的記憶，但卻使意識失去完整性。相對於傳統社會的和緩尺度，城市所涵蓋的物質環境、交通系統、人口密度、產業活動、社會事件等等都遠遠超出傳統領域的理解範疇，城市裡的突發性、不連貫性所生產的各式震驚因子日以繼夜的刺激著意識的自我防衛，個體則因價值觀的互相衝撞而「經歷」著城市。

齊美爾則認為，「大都會以其街道的縱橫交錯以及經濟、職業和社會生活的發展迅速和型態多樣，造成了它的心理環境」(simmel, 2008：92)，他認為近代的都市是一個過度刺激的都市。當作為一種「新文化現象」出現的近代都市需要發展時，理智性就越來越重要，因為只有理智性所支持的一種普遍性，才可以驅使一個龐雜的都市有所發展，近代都市具有與前近代的都市不同的規模，所乘載的人事物也來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只有理智性才得以賦予那些在都市中生活的、來自各種文化背景的龐大人羣一個共有的標準，反之，如果一個城市沒有一個共通的標準，那麼都市的混亂無序是不難想像的。由資本主義所支持的貨幣經濟以及啟蒙運動所支持的理性精神，對於近代都市的發展來說，則是非常重要的，而齊美爾指出，它們卻具有一種共同的「唯智主義」(intellectualism)式的精神品質。

在這種精神品質中，「理智」強勢的宰制著「感性」，生活環境不斷的「理智化」，已經達到一種不平衡的狀態。城市環境中的「唯智主義化」，在兩方面表現出來，一方面是人類為了要納入到資本主義支持的貨幣經濟體系中，而越來越表現出一種與貨幣的「計算性格」有所雷同的態度，也就是不考量到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只就事論事，猶如機械一般的態度；在另外一方面，城市人對於城市環境中各種多采多姿，複雜的事物，表現出一種漠不關心的態度，齊美爾認為這是貨幣這一文化形式在人身上所表現出來的正反效果，一方面人類透過一種就事論事的態度，表現出其對於貨幣經濟的順應，另外一方面，又對於由貨幣經濟所統制

的城市中的人事物，表現出一種厭倦感(*blase*)，因為，藉由人類的理智這一種精神能量，在生活中發揮效果，從而能對城市中各種複雜、大量的人事物視而不見，才能在一個集合了各種人事物，對於個人來說過度刺激的生活環境中生存。由此，齊美爾敘述了在一個過度刺激的城市環境中，人類是如何表現出其冷漠、焦慮、對各種人事物的厭倦、對環境的消極面對、以及人與人之間的疏離之感，以上種種，皆指出城市環境中存有一種潛在的負面情緒，齊美爾對於城市環境的論述，著重於闡釋人類在作為一種新文化現象的環境：近代都市中生活的心理狀態，因此，其對城市/城市人所做的闡釋，更明顯的表現出一種心理上的病狀因素，瀰漫在人/生活環境之中。

綜上所述，現代城市使人類身陷其中，而感到自身位置的迷惘、潛在的負面與消極、自身所透露的冷漠、人群的冷漠所導致的疏離感、生活內容所致的空洞感，可以說，是一種焦慮(*anxiety*)的反應，不論上述的種種情緒與感受，是一種呈現焦慮的表現方式，抑或是面對焦慮的因應方式，要從建築的角度發問的是，城市居民在城市中所衍生的焦慮精神品質是否反映在城市建築上，作為一個物質結構集聚的城市，如何也呈現出與城市居民相同的精神品質？台南城市所呈現的精神品質，是否、又如何具有一種獨特的本土內涵，甚能從城市的規模上反映出一種源自歷史的台南性格？

二、臺南城市的精神分析

對於本文所提出的問題，對城市進行精神分析式的閱讀，或有可能幫助本文進行對於城市精神品質上的把握與理解，而雅克·拉岡(*Jacques Marie-Emile Lacan*，1901-1981)的精神分析觀點，則提供對城市進行精神分析式閱讀的切入視角。拉岡的精神分析承自佛洛伊德而自成一派，因為其觀點有別於主流心理學界重視臨床之應用，而著重於精神分析中關於文學以及哲學的層面，強調要回到潛意識的研究，他認為：「臨床治療在精神分析之中只是一種副產品，精神分析學本身不是一種治療體系，不是一種解釋性或護理性知識的方法，而應該是關於聆聽和探求欲望的一系列技術。」(Sarup, 1992: 11; 轉引自王國芳、郭本禹, 2010: 85)而拉岡也將他的精神分析觀點，應用於對藝術作品的討論之上，因此，本文將台南市視為建築物之集合，而建築則作為拉岡精神分析中一種創發意義的能指，在此條件上對台南市進行精神分析式的閱讀與書寫。

拉岡透過在能指與所指間的斷裂處進行探索、追尋，發掘潛意識中的話語。拉岡藉由指出佛洛伊德精神分析學中關於夢之活動的「凝縮」(*condensation*)與「移置」(*displacement*)等概念與結構主義語言學中的「隱喻」與「換喻」之概念的相似性質，而提出「潛意識具有類似語言結構」的觀點，他並且指出，在這種觀點之下，潛意識可說是所指(*signified*)，而意識則是能指(*signifier*)。拉岡所說的能指與所指，是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原本對「記號」(*sign*)所做的內涵建構，他認為記號是語言的基本單位，而記號的組成則包含代表概念要素的索

指，以及代表語音要素的能指，不過，此兩者間並沒有必然的連結、指涉關係，也就是說語言中某一記號的聲音要素，並不是天生必然指涉其概念要素，而是經人為所建構而成的連結關係。另外，拉岡認為能指與所指，並不如索緒爾所說的，在記號之下處於平等地位，「表記¹首先是一種沒有意義的物質要素，處於某個封閉的差異區分系統之中。」(Dylan Evans, 2009: 313)它能夠生產出所指。蔣素娥進一步對此回顧²道，語言首先造成了生活經驗與語言符號間的分裂，其次是造成了「說話的我」與「語言符號中的我」兩個我的分裂，對於拉岡來說，這種無法彌補的分裂狀態，所造成的結果就是潛意識的產生。

潛意識的產生，源於能指與所指的斷裂之處，潛意識中的話語，即那些無法表達的意義，在意識中失落了，因此它們隱而不顯。但拉岡認為，這些失落的意義得以透過在語言結構中透過隱喻、換喻的不斷轉換，而在現實世界以不同的方式表現出來。據此，拉岡還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命題：「潛意識是他者的話語」，根據王國芳與郭本禹的回顧，拉岡所謂的他者，時而具體時而抽象，它指稱包括如下意涵：(一)父母。(二)構成主體言語可能性的潛意識場景。(三)聆聽他人言語的主體形成自身的場所。(四)言語活動本身，也就是作為象徵的能指的所在地。不過在一般情況下，「我們可以說『他者』就是潛意識的象徵性表述。」(王國芳、郭本禹, 1997: 114) 因此，主體從他處認識自己，在對他人的觀看、了解中也觀察、了解自己，從而得以建構自己。

就城市來說，透過建築物被建設，物質以單位的整體呈現在城市環境之中，而對居民宣說其內涵、生發意義，因此可以說，建築物的結構、形式，建築物的物質構成，正是拉岡精神分析思想中的能指。如果說建築物是一種能指，那麼其建築形式對於其價值、象徵性、無形的意義等，也就表現出一種強勢的姿態；因為拉岡認為，能指之於其所指，是處於強勢、優先的地位，透過建築物的物質形式建構，它同時創造了所指這一心理內涵，進而呈現於城市環境之中而有所表達。由此，必須對於建築形式上能夠直接閱讀到的語彙跟表面的意義，進行再分析的動作，只有如此，失落於能指、所指間斷裂之處，藏於潛意識中的隱諱意義才得以浮現。而由此展開的對於臺南精神形式闡明工作，用拉岡的話來說，就是使隱藏在潛意識中的意義生發而出。

王國芳與郭本禹對潛意識的表現形式回顧道：「潛意識的表現形式主要有症狀、夢、口誤、筆誤、行動倒錯及玩笑等。佛洛伊德認為這些現象都具有象徵意義，是潛意識的本能欲望的宣洩。」(王國芳、郭本禹, 1997: 95)拉岡認為，「癥狀就是一種隱喻，欲望則是一種換喻。癥狀就是被壓抑的事物的象徵或替代，欲望則是透過偽裝進入意識。」(王國芳、郭本禹, 1997: 110-111) 身為能指的建築或可能是一種銘刻於城市身體上的「城市症狀」。

據狄倫·伊凡斯(Dylan Evans, 1966—)所言，拉岡所謂「症狀」(symptom)「表現了潛藏的疾病，沒有症狀，疾病就可能無法被偵測到。因此，症狀這個概

¹ 能指、符徵、表記，皆為 signifier 之中譯。

² 詳見蔣素娥〈遇見潛意識——拉岡精神分析世界的語言作用〉(2006)一文。

念意味著在表面與深層之間、現象(可以直接被經驗到的對象)與無法被經驗到，而須推論出來的那些現象的隱藏原因之間的基本區分。」(Dylan, 2009: 341)狄倫認為症狀在拉岡的作品中通常指的是精神官能症的症狀，也就是佛洛伊德所說的那種「雖然與正常人的性質無異」，但從「量」的比較之上就能觀察出差異的各種「生活內容」，「拉岡追隨佛洛伊德的腳步，認定精神官能症狀是由無意識所形構，症狀永遠是兩種衝突的欲望妥協所造成。」(Dylan, 2009: 342)；狄倫繼續提到，拉岡認為症狀猶如語言般所結構，依據拉岡應用此詞之時代不同，症狀的語言特色也更加豐富、多重，包括認為症狀是一種能指、也被認為是一種表義過程(signification)、代稱(metaphor)、以及被描述為「訊息」；「症狀的出現，其實正是心靈狀態符號化的過程。肉身之症狀無法解釋生理的病變。」(劉紀蕙, 2004: 101)凡此種種皆顯示症狀有所表，而能提供對於主體的認識、理解，並在某種程度上統合了顯然矛盾的意識，以及潛意識。另外，它也提供了一條對於城市中「症狀」追尋的線索，也就是關注城市中「量的異常」。

從建築的角度出發，對城市進行一種精神分析式的閱讀，可以說，要追尋的就是作為城市身體一部份的「建築徵狀」，較之於「症狀」與「癥狀」等詞，「徵狀」既包含上述兩者之內涵，也將兩者除病化，城市中的建築作為一種症狀，是在城市身體上發生的物之展演、物之言說，是有精神內涵的物之表現，它們構成了臺南市的「城市徵狀」；對其所表現的涵意加以分析，在反覆的相互對話之中，能得到的收穫是城市中的建築徵狀在台南的城市環境中所表現出來的獨特意義，正如克莉斯蒂娃(Kristeva, Julia; 1941—)所認為，「它們各自以症狀的方式回應此歷史轉折，因而透露出特殊的主觀位置。」(Kristeva, 2000: 88；轉引自劉紀蕙, 2004: 14) 城市這樣一種獨特主觀地位的顯露，可視為是對劉紀蕙所說的那種「台灣被遮蔽的他性」的探索，由此，本文或可闡明的是在官方論述之外，台南城市透過建築所展現的獨特個性，這種個性猶如城市中代代居民的集體性格透過物質構成，再現於城市環境之中，由此，建築承載與創造了人類的精神，並與之連結而緊密聯繫於環境，在此台南市便具有能被發掘一種源自於在地歷史的「台南」精神形式之潛力。

劉紀蕙認為，「症狀並不指向另一個原初的場景或是意義。症狀是受難經驗本身。面對恐懼，面對推離賤斥的對象，我們看到了過去，看到了歷史他者，也看到了處於他者位置的自己，作為受難者、施虐者、身為共犯的自己。」(劉紀蕙, 2004: 90-91)他主張「要揭露人類歷史被遮蔽的過去，尋求文化現象背後的抗拒與迷戀動力，就需要仔細閱讀文本所提供的各種主觀位置的線索。」(劉紀蕙, 2004: 43-44)並且，她還說道：「在精神分析式的閱讀中，語彙或是圖像的表面指涉意義並不能解釋全部，歷史事實亦並不佔據決定意義的絕對位置，重要的是要捕捉文字或是圖像的象徵形式中所流動與交換的幻想，以及此符號運作底層的文化衝動，或是我在本書中將要討論的『真實』(the real)，或是『精神現實』(psychic reality)的問題。」(劉紀蕙, 2004: 48-49)因此，本文對於城市建築之閱讀，並不是僅將建築視為歷史之具現，僅描述其「過程」，而是在閱讀當代臺南

城市時，進行「徵狀」的追尋與讀解，探索反映於當代城市中卻緊密關聯於歷史的矛盾、隱而不顯之處。

正如拉岡所謂「潛意識是他者的話語」，這樣一種對於城市徵狀的探索與分析，對於城市隱而不顯之處的發掘與表現，就是一種對城市的「他性」之發掘，也是一種以質疑自身的方式來認識自己的過程，由此所牽涉到的是一種關於「認同」的問題，也就是如何質疑原本為大眾廣泛認同的臺南形象，又如何有說服力的提出一個大眾願意與之對話、互動的新形象詮釋；關於這點，要提到的是佛洛伊德的認同(identification)概念，佛洛伊德的認同概念是指主體將其他主體的特質內化為自身特質之過程，而拉岡則更區分這個概念為想像認同與符號認同等兩類，想像認同意指嬰兒於鏡像階段與鏡中幻象的一種想像認同，由此，一種想像中的自我：理想自我³(Ideal ego)從而得以建立；而符號認同則是認同父親的象徵，從而進入符號層的過程。對於拉岡來說，精神分析的結束就是「主體呈現一種匱乏狀態的時刻，是當主體的認同受到質疑，不再能以先前那種方式維持的時刻。」(Dylan, 2009: 135)就城市來說，一種精神分析式閱讀的目的就是在於使對於城市的普遍認同受到質疑，甚至崩壞，由此，也可以說對於臺南城市徵狀的追尋，是在於發掘臺南市透過建築所呈現出的「匱乏」，並從中試圖讀解一種由精神性質與具體表現形式共構而成的「臺南精神形式」內容。

三、臺南城市的創傷經驗與城市徵狀

臺南市在台灣，身為一個具有歷史代表性的現代都市，它本身就是一種徵狀。現代城市作為建築物之集合，而為一視覺整體的現實情況，本身就是一種相較於傳統鄉村、城鎮的「量」之上的巨大差異，而「由量變所產生的質變⁴」，在居民、城市生活環境、建築物之中直接有所展現，從這一點來說，現代城市本身就是其當下周圍更廣泛區域中的「徵狀」表現；然而，另外不能忽視的是城市本身的歷史，如臺南市自 17 世紀始有荷人建城，而且相較於近代化對於歐洲城市來說，是一個平穩文化進程的情形下，竟也有如班雅明、齊美爾所論及的那種震驚、過於刺激等對城市劇烈的精神內容敘述，那麼東方城市普遍被動的近代化過程，更甚是有如台灣所接受的，由日本所強行植入於城市脈絡中的「二手」近代化過程，其對傳統文化之衝擊只有更加強烈，而在急速改變的城市景觀中，面對此一近代化潮流的城市居民，其精神狀態相較於班雅明與齊美爾對城市論述中的劇烈情況，想必也只會更有更甚之表現。

關於亞洲國家對源於歐洲的現代性體驗，劉紀蕙這樣說：「線性史觀下的落後亞洲正是亞洲民族創傷匱乏感之原因，也是朝向進步與現代國家的動力基礎，

³ 嬰兒在鏡中看到了自己的虛假影像，將這個虛假影像認同為自己，以之為自身的理想形象，進而形塑了自我，因此，鏡中的嬰兒幻影就是一種理想自我，雖然它是鏡中的虛假影像，然而它也是兒童形塑自我、賴以發展、想像自身未來的理想整體。

⁴ 城市龐大的規模、複雜的人事物首先表現在相較於鄉村的「量」上的巨大差異，這種量的差異所形成的，是一個對人類來說，全然不同於以往的新性質生活環境。

我們甚至可以說現代國家成為了遮蔽創傷的戀物式替代對象。」(劉紀蕙, 2004 : 10)亞洲國家、臺灣、臺南市特殊的現代性經驗, 被視為一種「創傷」而觀之。在古典精神分析中, 創傷的意涵如下:「創傷(或精神創傷)(trauma)是主體生命中的事件, 其定義在於其激烈性、主體無法予以適當回應、以及它在精神組織中引起激盪與持久的致病狀態。以經濟論詞彙而言, 創傷的特徵在於, 相對於主體的忍受度以及其在精神上控制與加工刺激的能力而言, 過量刺激的匯流。如同弗洛伊德所言:『我們以創傷稱呼一種體驗, 它在短時間內造成心靈生活中如此強烈的刺激增高, 以致無法透過慣常的方式予以解決或加工; 這必然導致能量運作上持久的紊亂。』」(Laplanche J.、Pontalis J.-B, 2000 : 536-537)劉紀蕙也有類似的回顧:「佛洛伊德對於創傷經驗的說明是,『一種經驗如果在很短的時間內, 使心靈遭受到非常高度的刺激, 以致無論用接納吸收的方式或是調整改變的方式, 都不能以常態的方法來適應, 結果使心靈的有效能力之分配, 遭受到永久的擾亂, 我們便稱之為創傷的經驗』(〈創傷的固著潛意識〉 264)。」(劉紀蕙, 2004 : 100)因此, 對於臺南市建築來說, 它最具代表性的創傷經驗, 就是日治時期建築的近代化。它最大的傷口, 乃其自日治時期起近代化城市建設過程中所加諸於城市環境之上的物質紋理, 對於傳統城市格局的切割與毀壞。這個代表性的建築事件對當代的臺南城市是影響深遠的, 對於臺南傳統生活環境來說, 它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歷史創傷」, 也是「創傷經驗」的物質具現。

劉紀蕙提到:「佛洛伊德還說,『創傷的』這個辭彙除了『經濟的』意義之外無他, 也就是說, 心理歷程中主體無法應付當時驟然發生的巨大深刻經驗, 因此以固著的方式停留在當時發生事件的場景, 強迫性的反覆演練修正, 以便進行某種象徵交換。這也就是『症狀』的產生。〔 . . . 〕此處心力的集中有如生死交關, 而完成的是一種轉移或是交換替代。〔 . . . 〕(〈症狀的意義〉 205-51)〔 . . . 〕。」(劉紀蕙, 2004 : 100-101)由此, 可以說當代臺南城市之物質構成, 不是「因無法走出創傷陰影而不斷呈現受創當下」的各種再現, 就是以「積極走出創傷的復健活動」作為其構成之合理性的各種理直氣壯的建築生產, 其中包括如抵抗、逃離、克服、重建等各種面對創傷經驗的態度; 不論城市中的建築在性質上從屬何者, 抑或同時從屬於兩者, 所顯示皆是一種對於「近代化創傷」過程念念不忘的「徵狀」。

對於臺灣來說, 日治時期是城市近代化的重要過程, 而對臺南市來說, 除了近代化的意義之外, 日治時期的都市建設也是對於傳統生活環境的大規模毀壞過程。日治時期對於臺南市所開展的都市建設工事, 是對於傳統城市紋理的毀壞, 這種毀壞的過程, 自 1911 年臺南市首頒「臺南市區改正計畫」後, 更以一種系統化的方式在進行著, 由此計畫之理念統領城市建設工事之進行, 而此計畫更因應城市實際情況而重、續修於 1921 年與 1941 年, 黃武達對於日治時期都市計畫及其統領之工事對臺南城市的巨大改變如此提到:「以歐美之都市計畫理念, 強行加諸於本土之社會, 對於臺南市傳統都市空間結構之影響最大。」(黃武達, 1995 : 5-42)因此, 可以說「日治時期」是對於臺南城市來說是「創傷經驗」的

代名詞，一種新的生活方式在這個時候被全面的引進，並大規模置換城市的紋理；譬如對台灣人來說街廓這一全新的空間概念，在日治時期伴隨著計畫道路的開發而對城市紋理的重整，導致在日治時期，臺南市的原府城範圍幾乎已成計畫道路與街廓組合構成的幾何塊狀網紋理，這就是對城市紋理一種大規模的置換。從物質構成的角度觀察在這種情況下的臺南市，所陷入的是「能指」的混亂狀態，源自於外來者的歐美都市範型，與臺南市已發展臻至成型的傳統都市結構碰撞，兩種不同系統的能指網絡同時出現在城市中，既有的能指被凍結、禁止使用，而對於西方建築語彙，城市居民又不知其所指為何，但是執政者卻以它來指涉城市的發展與美好的前景，以及殖民者權力的象徵，這是一種能指與其所指間的斷裂，而它以種種焦慮的精神狀態蔓延開來，身處其中的人們產生了不知如何讀解的茫然、視之為所謂「進步」的順從之舉、或者以逃離、抵抗，所有這些困惑、茫然、臣服、否定等精神狀態，證實日治時期的創傷經驗，透過環境對人產生影響，而人又影響環境建設，如此循環反覆，造成當代臺南城市之建築具有獨特的精神品質。

在這個基礎上，本研究觀察到當代台南城市中兩個近年來頻繁出現的城市現象，他們或以「異常的量」出現在城市中，或者在城市中被反覆操作論述；執政者與人民都對其展現極高的興趣，所以可說它們是一種城市的「徵狀」。第一個城市現象，是近年來發生在台南城市建設或建築建設過程中，不斷出現的復古手法，也就是在建築的過程中，採用源於歷史、傳統的建築語彙來作為其形式，這種現象包含了官方「府城再造⁵」論述下的城市建設，以及民間自力的建築活動；第二個城市現象，則是對臺南市原「府城」區域內的歷史建築與古蹟，進行一種以文化資產保存、城市形象營造、觀光或經濟為目的的建設工程，使台南城市中的歷史建築與古蹟，在城市中被刻意突顯為視覺上的焦點；這兩種現象近年來在臺南市中興起，甚至它們擴散至原府城區外的範圍，成為一種最新的經濟手段。本文嘗試說明這兩種城市現象與臺南市建築創傷經驗之間的關係，以及由此進一步分析下所呈現的匱乏，因此，本文以「創傷經驗」發生的日治時期開端，西元1985年為準，劃分為1895年之前：日治前、以及1895年日治時期後等兩個時期，並從這兩個時期中，各擇一棟從臺南市建築「創傷經驗」的角度來看，最具代表性的建築，以此來進行之間的對話與探討，如此，對於這個臺南市中重大建築事件所造成的斷裂，進行更深入的了解。

臺南市建築「創傷經驗」的來源，用建築的話語來說，就是建築的近代化潮流與臺南市既有⁶建築形式中歷史、傳統語彙的衝突，在這個於臺南城市中全面發生的建築事件裡，既有的建築乃至城市紋理，明顯的居於劣勢，而受到近代化潮流的主宰、排斥與抹除。綜上所述，本文針對此一建築事件所選取的兩個代表

⁵ 此指趙珮伶在《府城都市意象的文化再現與空間實踐：以孔廟文化園區為例》中所提及的：「1997年底，台南市都市政權改組由藍轉綠，在張燦濤市長任內，打出了『府城重生、都市再造』的口號(台南市政府，1999：12)，希望以清領時期的『台灣府城』之含括範圍為基礎，利用實際的空間營造再現舊時府城風貌。」(趙珮伶，2007：27-28)

⁶ 指1895年之前存在於臺南市中的建築物與物質構成。

性建築是孔廟與臺南州廳，對於臺南市來說，「臺南州廳」是日治時期地區上的政治中心，是區域上伴隨著近代化而來的極權統治、強勢控制、規範、逞戒者之象徵；而「孔廟」所象徵的則是一種想像中的傳統與正統，它以儒家精神領袖之信仰，而與中國深厚的儒家文化相連，而得以象徵歷史悠久的「中華文化」。因此，孔廟與臺南州廳是象徵臺南城市近代化過程中由建築所體現出衝突的最好例子，因為它們是相異國族、殖民者與被殖民者、傳統與近代間的衝突，透過物質形式而展現的最佳案例。

四、臺南州廳：對於自己身體的疏離與對身體原型的認知缺乏

臺南州廳具有純正的「日本」血統，它在 1910 年由時任臺南廳長的松木茂俊申請建設，並由臺灣總督府營繕課技師森山松之助(1869—1949)設計，完工於 1915 年，並於 1918 到 1920 年間增建主體側邊兩翼。關於臺南州廳的空間使用歷程，自 1916 年到 1945 年間，臺南州廳一直是日治政權下，區域上的政治中心；1945 年，美軍對臺南市進行大規模的轟炸，臺南州廳在空襲行動中受損嚴重而荒廢四年。自 1949 年起，空軍供應司令部(現空軍後勤司令部)撤退至臺南後，對臺南州廳稍事整修並作為其辦公處使用，至 1969 年的二十年間，它一直作為軍事/行政之用；在 1969 年，時任空軍供應部司令的陳御風將軍將臺南州廳移轉給當時的臺南市長林錫山，而臺南市政府遷入臺南州廳起，至 1997 年 9 月 30 日止，臺南州廳都作為臺南市政府之用。1997 年後，臺南州廳配合文建會之計畫，而開始整修，自 2003 年底臺南州廳更名為「國立台灣文學館」而啟用至今。

臺南州廳在日治時期作為區域政治中心的代表性建築，具有它的象徵性意義。首先，它是外來殖民者所築，因此始有一種先天上與臺南市民之間的疏離性。其次，臺南州廳作為一區域之「政治中樞」，執行種種對於臺南市民來說極其武斷的政策，因為這些政策所考量的，是「殖民者」的地位如何鞏固的問題，從建築層面來說，也就是執行對於城市紋理、建築形式中傳統、歷史元素的「排除」與「改正」工程，在整個過程之中，城市環境的絕大多數使用者卻無法參與，只能被動的適應全新性質的生活環境。因此，它具有一種強勢的侵略性，以及由上而下的極權性，而來自日本執政者的武斷政策所具有的一種由上而下的殖民性格，也使得臺南州廳加劇其與生俱來的疏離性。綜上所述，臺南州廳所象徵的是侵略性、極權性、與疏離性，它集三者於一體。

臺南州廳自 1945 年政權移轉後，歷經荒廢、整修而挪作空軍供應司令部、臺南市政府之用，並在之後因應城市發展計畫之進行，市政府另覓新址而空出此建築空間時，再度整修作為台灣文學館的藝文用途的過程，不僅可以看作是一種政治中心移轉後的空間再利用、文化資產保存的實踐、以及區域機能、發展之維持的手段而已，還可以將其建築本身與其用途之轉換，視為是一種拉岡所說的能指與所指間關係的發展歷程。從這個角度看臺南州廳，所見的除了透過建築結構、形式與其使用機能間所表現出的，拉岡所謂「能指與所指間必然發生的斷裂」情

形之外，另外值得關注的則是臺南州廳本身的三次增/改/整建，這數次的增/改/整建，可視為臺南州廳身為能指的自我調整、再結構的轉換過程。

臺南州廳第一次的增建是發生在日治時期的 1918 年至 1920 年間，對臺南州廳加建兩側斜角雙翼，實值 1911 年臺南都市改正計畫頒布實施後，於 1911~1922 配合進行第 2 期市區改正工事之末⁷，一種全面的對臺南市的傳統物質紋理的規訓、抹除工程正要告一段落，而對於作為區域政治中心建築的增建，正是一個完美的結尾。作為增建項目的兩側雙翼以臺南州廳的中央主體為準，各自向後傾斜約 45 度角，猶如極權代表插上雙翼，似要起飛一般，在城市中心耀武揚威；從臺南州廳的正立面來說，它構成了龐大的外凸三面體，相連為一個有菱角的半圓狀，使它在城市的中心監控著城市環境，具有更廣闊的視野。由此，臺南州廳對於被殖民者/城市中既有建築的極權統治地位、更為全面的監控、握有城市發展主宰權力之地位，就不證自明；就此來說，臺南州廳的設計者森山松之助在這方面的建築意象營造是非常熟稔的，因為他在 1908 年就負責過台灣總督府(現台灣總統府)中央高塔修改的設計，而中央高塔的增高被視為殖民者威權的強烈象徵。因此，可以將臺南州廳 1918 年-1920 年的建築雙翼增建，視為是對其所象徵著的侵略、極權、疏離性質的加強過程。

1945 年 3 月，臺南州廳遭逢空襲而受損嚴重、不堪使用：「1945 年(昭和 20 年)美機空襲臺南，臺南州廳木構屋頂、門窗幾乎全部燒毀，立面牆體彈痕累累，以致荒廢。」(范勝雄，2011：17)臺南州廳 1945 年的崩毀，可以視為一種能指的被摧毀，伴隨著日本裕仁天皇在同年 8 月 15 日以無線電廣播宣布投降，已成廢墟的官廳建築無人修繕，猶如殖民者的挫敗一般，它曝屍於臺南城市中心，以半存軀幹示眾，也就是說，臺南州廳這一個被毀壞的能指，並非消失，而是一種能指的再建構，它以殘缺的身體，巧妙的對應了台灣殖民政權的崩毀與解放。自從遭美軍空襲而毀後，臺南州廳荒廢四年，至 1949 年，因應由上海撤退來台的空軍供應司令部欲將臺南州廳作辦公之用，而對其施以整修。曾作為日本執政者權力代表的臺南州廳，在 1945 年政權輪替之後，再次服務於另一個外來政權：國民政府。原本臺南市所在的台灣，位於國民政府統治範圍的邊疆地帶，然而在 1949 年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後，遂成為其主要的根據地，伴隨光復後台灣人民所感受到的中日社會情況的落差所產生的失落之感，以及 1947 年的二二八事件中中國執政者的強勢、粗暴對待⁸，加上 1949 年的戒嚴令施行，臺南市民心中那個朦

⁷黃武達在〈日治時代之臺南市近代都市計畫(一)-都市計畫之萌芽與展開-〉一文中，指出日治期間臺南市共進行過四次較有系統的市區改正工事，分別為第一次：1902 到 1910 年、第二次：1911~1922 年、第三次：1926~1929 年、1930 年開始的第四次市區改正工事。

⁸對於台南市來說，二二八事件在台南的發生，由受難者湯德章的身世與遭遇，將國民政府、日本殖民政府與台南市民連結在一起，成為一個經典的對話範例與顯著的象徵。現在位於以往城市核心湯德章紀念公園，即以二二八受難者湯德章為名而對其紀念之，它猶如嘉義市的陳澄波那樣，是台南市之於二二八事件一個著名的受難者。湯德章之父為日人新居德藏，死於 1915 年西來庵事件之中，而湯德章本人亦受日本教育(日本中央大學畢業)。在日治時期，湯德章因有台灣血統而備受日人歧視，二二八事件之後，湯德章負責維持台南治安之公職，又身為台南市民選市長候選人之一，作為台南市民之代表；3 月 11 日，國民黨政府情治單位強行進入湯家搜索，而湯一

隴的、原本以為能投向其懷抱的那個溫暖的中華「正統」政權，也浮現其具體輪廓。

雖然在台灣人民眼中，國民政府體制下政治/軍事單位進駐臺南州廳，較之於臺南州廳原本所象徵日本統治的強烈性格，猶如一種「鎮煞」之舉，然而，國民政府身為一個「外來政權」的身分在上述因素下益發突顯，其極權性、疏離性、侵略性無異於日本政權，這使得台南市民對於兩者的負面情感越加能夠重疊、連結再一起，加上對於臺南州廳之空間使用屬於軍事單位辦公用途，因此，其使用者鮮明形象、及其所傳達的肅殺氣氛，使得臺南州廳的建築形式仍能藉由其表面上的軍事/行政使用，而指涉它一直以來所具有的「政治」意義，還有那些源於日治時期的象徵。身為能指的臺南州廳建築形式與其所創造意義之間的關係，在政權轉移後，顯然在整體意義上並沒有太大的轉變，透過建築的形象，仍能讀解到極權、侵略與疏離的內涵，而促使此意義持續透過建築形式生發的，竟是令臺南市民原本意想不到的「中華同胞」，更勝日本殖民者的一種疏離感與侵略性便是由此而生。國民政府對於臺南州廳這一能指的調整與再結構，目的上無異於日本政權，甚至可以說，只是加強其指涉既有意義的強度，在變更了執政者的身分、民族之後，這種由「自己人」所創造的殖民性，所散發出的極權、侵略與疏離之感，更是令人畏懼。

1969年，臺南州廳轉用為台南市政府，復又回歸其區域政治中心的象徵與相關的政治用途。自1969年起，至1996年的這段時間中，經歷了解嚴、台灣本土性的崛起、政黨輪替，以及文化作為經濟後盾的世界潮流，臺南州廳所象徵的極權、侵略、疏離性，也隨著經濟發展與社會的趨穩，而漸漸淡化其意涵。臺南州廳在這段時間，作為市政府所在地，以一種城市管理/發展/決策中樞的象徵出現，甚至有時，能夠因為它所具有對城市發展的權力，而將對於城市發展的美好前景幻想也附著其上，而使它甚至成為一個「美好未來的實踐者」之角色。然而在這種對臺南州廳這一顯著標的物的凝視與夢想投射動作中，所觀察到的，是對(市民)自己能動性不足的承認，是對他者權力的屈服與認可其效力的臣服。城市居民對於臺南州廳的這種情感，伴隨著解嚴後聲音多元的風潮，市民便在一種對自己雖無自信，但對權力持有者漸無畏懼的驅力之下，衍生一種「在尊敬前提下的議論紛紛」，其中所討論與質疑的，是看似絕對且既定不變的規則、神聖不可侵犯的官方論述、地方論述的現形、在場與位置。建築形式所透露的莊嚴、古典之感，仍為市民所「尊重」，它是作為一城市中心，但在台灣聲音多元的社會趨向之下，它也成為一個最為典型的「被質疑者」。可以說，對於臺南州廳所象徵著的中樞的質疑與討論，是對於被閉鎖了一甲子以上的「現代生活內涵」的討論，更是對於現代生活與地方歷史兩者間關係的討論，臺南州廳作為一個「被質疑者」，在此雖能保全肉身，但不免受到各種無形的挑戰，在立場本已搖擺、混亂的情形

面拒捕並銷毀相關資料名冊，使有關人士與大學生得以幸免於難，因此，其遭刑求，並被當時的國民黨軍視為叛亂分子而槍決，曝屍示眾。隨後，名列二二八叛亂疑犯送法院審理，獲無罪判決，證明其為無辜。湯德章的本土性格，益發凸顯其與外來政權的對話，以及當時的國民政府與以往在日本殖民政府兩者對台灣治理上類似的性質。

下它註定「魂飛魄散」。

自 1997 年臺南州廳因將作為台灣文學館之用而整修、啟用後，臺南州廳作為一能指，與所指之間的關係就在性質上表現出截然不同，臺南州廳作為台灣文學館這一空間用途的轉換過程，不僅是使用機能上的轉變，更是臺南州廳象徵意義上的轉變，也是能指自身的形式調整、轉換過程，從而能創發新的意義。象徵著極權、強勢、疏離的臺南州廳，被免除了作為行政用途的功能，而失卻了關於「政治性」的指涉，在對於其原有的極權、強勢、疏離的意義展示上，更是頓失力道。至此，臺南州廳就戲劇性的「走入文學」，這不僅指稱其以「國立台灣文學館」之姿「投胎轉世」，還指臺南州廳本身價值的浮動與待商榷情況，使它毫無阻礙的投入一個更廣大的詮釋空間，具有了更多被書寫、言說的可能性。

至此，臺南州廳所身負著的日治時期歷史，它所象徵的由傳統生活唐突邁向近代的巨大裂口，便真正的宣示，它以一種更為流動的方式展示著它自己的事實，因為綜觀臺南州廳所經歷政權移轉後的使用，其作為能指的再調整、再結構過程，也就是臺南州廳的多次再建過程中，莫不具有一種特殊的傾向，即在不拆毀的原則下，對其進行傾向保存原貌的建設，在其作為台灣文學館使用之後，可以說，自光復以來，臺南州廳所創發的各種意義與其建築形式、結構間的關係，不見拉岡所說的「能指對於所指的強勢性關係」於此，而且關於這種關係的實際情況，甚至是以一種完全相反的態勢所表現：也就是各種豐富意義以各種方式企圖依附到臺南州廳的能指之下，與其原本所象徵的極權性、侵略性、疏離性融合，企圖主導臺南州廳這一主體。這種企圖，在近年來臺南市城市形象營造過程中，以及「府城再造」的論述之下，達到高峰；而臺南州廳這一能指，在其本身的外來性質與臺灣社會政權更迭所造成的語境混亂情形下，對於各種意義的侵入，以及各種對所指進行刪除、改造的行動，毫無抵抗之力，甚至受其影響而改變⁹。

由此，可以說，今日臺南州廳既不再是令人又恨又敬又畏的外來殖民者，也不是令人同仇敵愾的死敵、世仇，也不能肯定的說它代表過往建設地方有成的英雄，在對於其身分的認定上，陷入一種不得不模糊以對的情況。它只在書寫之中，處處透露著它看似活躍，實則四散的魂魄，各種意義對能指的強勢介入，使源自日治時期的臺南州廳得以乘載任何對它的情感投射，以各種樣貌出現，就像是肉身腐朽但魂魄卻處處顯像的鬼魅。這種現象，證實了關於城市重大創傷的一段歷史，在當代已為人所忽視，城市居民已被除卻任何關於這段歷史的獨特不可侵犯的情感，當然也失去對這段歷史獨特的感受能力。臺南州廳便以一臺南古蹟之姿，被歸類為城市發展的臺灣近代建築範型之一，而效力於臺南城市行銷，還成為城市中各種建築活動復古手段所成就的「府城」夢境中的核心之一。透過各種「以文化帶動消費」或「提升城市自明性」為目的的建築，在建設過程中以臺南州廳為核心而相應移用的古典語彙，臺南州廳魂飛魄散的情況，在城市中以物質具現，在台南市中如雨後春筍般相繼展現。

透過種種復古手段、加以城市行銷之渲染，而在遍地開花的歷史碎片中形成

⁹ 如做為空軍供應司令部辦公之用時的整修、擴建，以及作為台灣文學館之用時的整修、改建。

一個新場景的臺南州廳，表現出臺南性格中的一種飄泊無根。臺南州廳透過其眾多疏離因素共構而成為此一象徵；首先，它源自於一個不復返的外來政權，只能隔海遙望，卻無力以自身承續其歷史而活，這就是一種與其起源間的疏離；其次，它始終所具有的外來性，讓它自己與臺南市民之間造成一道鴻溝，是民族的鴻溝、殖民者與被殖民者間不可逾越的界線、也是近代與傳統的衝突。由此所形成的這種漂泊無根就是對銘寫於臺南身體上的徵狀的詮釋，這種徵狀的精神傾向，是歡迎對自己多重的詮釋與不同觀點的書寫，然而在具體表現上卻傾向於投向歷史的懷抱而裹足不前，因此以一種自我實現的方式，大興土木建設以自己為中心而開展的歷史場景再現，所透露的，是對於家的渴望，所要求的是一種歸屬感，在區域上、國家間如何找到一個能夠安身的位置，對於自己的歷史要從何種角度觀之。

以臺南州廳為核心所表露的臺南建築徵狀，揭示了臺南城市尋找典範以建構自身、認識自身的企圖，及其歸屬感的匱乏，承載了複雜文化背景發展而成的城市，對於自己身體原型認知上的缺乏，以及對於身體某些部位的不相容與疏離，如此所造成的混亂，在城市之中蔓延，展現為各種名為建構自身的嘗試，實則為一種以復古建築手段所表現的徵狀蔓延與擴散。

五、孔廟：對於自己陌生、破碎身體的畏懼

台南孔廟由陳永華發起，建於明鄭時期的 1665 年，當時被稱為「先師聖廟」，設有國學。清領康熙時代，將塌毀的先師聖廟修建，改稱為先師廟，並設台灣府學。1749 年，在巡台御史楊開鼎的提議下重建孔廟，1777 年又再加以整建，在東大城坊外增建泮宮坊，大成殿西邊增設府學署，此時為孔廟規模最大的時期。而後的孔廟因嘉慶與同治年間的地震逐漸毀壞。1916 孔廟計畫整修，並於隔年開始動工，此次的整修工程形成了今日孔廟的格局。戰時孔廟也因位處市中心而受戰火波擊，戰後市政府對其分批進行整修，1983 年，孔廟被列為一級古蹟，期間孔廟又歷經多次的大規模整建。

臺南市孔廟對於臺南來說，代表了拉岡所謂兒童鏡像階段中的一個理想對象，也就是嬰兒看見了鏡中的自己，認同了鏡子裡的虛假影像，由此形構「自己」是為一獨立、完整主體的概念，在這個過程中所表現出的就是一種認同他者的現象。也就是說，孔廟對於臺南市來說，是一種想像中的理想對象：作為整體的中華文化，是想像中的中華傳統、正統。日治時期以前，臺南孔廟就是一個教育與信仰結合的機構與文化象徵，它在明鄭與清領初期，曾作為全台的文教核心。信仰與教育結合的現象從孔廟的建築構成中就能清楚觀察到，首先，它位於東邊的入口立有設於 1687 年的「文武官員軍民人等至此下馬」碑，以表示對於至聖先師的尊崇與敬畏；另外，其主體建築群的配置為左學右廟，左側為教育用之空間，而右側則是祭祀等禮儀空間，也非常直接的表現出教育的目的，以及對於儒家信仰的培植與鞏固，孔廟所進行的教育活動，是對於儒家信仰內涵的教育，而其祭祀

內涵，則是對於儒家道統的崇拜。「中國自古崇尚儒教之說，重要城市均設有孔子廟」(傅朝卿，1998：12)，因此，內含了以儒家信仰為核心的教育與祭祀禮儀活動的臺南孔廟，便成為一個與中國、中華文化有所連結的強力象徵，它透過傳統的建築形式，及空間的使用內涵，強烈的對中國進行反復的指涉，由此，臺南市透過臺南孔廟，想像一個理想的文化整體，想像自己成為中國的城市之一。事實上，在孔廟的空間使用中，也可以明顯的看出它所進行的教育活動實際上就是一種鏡像工程，被祀奉於堂上的儒家先賢，供學堂中正待教化的莘莘學子作為效法典範。由此，可以說，孔廟身為一個運轉著的鏡像工程機器，它本身對於臺南市所的意義就是「作為整體的中華文化」這一理想對象，供臺南市作為效法典範。

孔廟這一種作為理想對象的象徵，以及其所帶有的鏡像工程本質，事實上持續都對臺南市發揮著效果。在明鄭時期，因為政治的意圖，它被作為將中華文化植入臺灣的媒介，而日治時期也秉承相同的動機，對孔廟的既有教育內涵進行置換的動作；而國民政府則以孔廟所表徵的「中國正統」形象來遂行其政治意圖，即對於「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強調；最後，當代台南則依靠孔廟來論述台南城市發展於台灣的重要性，以及強調台南城市在台灣的「歷史悠久」與強烈的「文化根源」，以此為城際競爭的籌碼、文化創意的基底。由此所透露的孔廟的發展，除代表中華文化在臺南市的生根、發展中斷與恢復發展、擴展外，還強烈的顯示了孔廟象徵一個臺南市發展過程中的理想對象，作為「他者」的必然性，不管內涵為何，總之，在本質上孔廟必然身為他者。當然，所謂的他者亦包括孔廟最初內含的「中華文化」所形構的理想形象，它所象徵的是中國歷史久遠的文化和傳統，是一幅對於海島台灣來說，宏大的理想圖景，因此它建構了一個完整的形象，讓處於鏡像期的臺南市，透過孔廟這一形象，及其背後對中國這一個完整文化體系的指涉、象徵，而得以認識自己，並將自己納入到這個想像的形象中而安置自己，然而必須思考的是，將自己納入到更廣大文化體系的過程之中，是否失卻了創造自己更清楚輪廓的積極性與能動性呢，透過中華文化這一他者，確認自己身體的獨立性與完整性之後，創造性的發展是否在「尋根」的過程中失落與麻痺了呢？

從孔廟在日治時期的情況與發展，可以看見的仍然是一種焦慮的展現。日治時期，在日本政權對台南所進行的近代化空間改造工程如火如荼進行下，孔廟因為作為具有規模、文化代表性之建築，因此相對於被改造、拆毀的既有城市格局、建築，它則被吸納入近代化的城市格局、新型的街廓系統之中，為日本政權所保留、利用。這樣一種結果也是意料之中的，臺南市對於殖民者來說，只是一個尚未近代化的城市，在他們眼中，臺南市仍未經歷所謂的鏡像期，因為臺南市在日治時期前所經歷的鏡像階段，它所效法的他者，是作為日本殖民者的敵人的中華文化，因此，臺南市已然經歷的鏡像階段就不為日本殖民者所認可。這個時候，孔廟這一鏡像工程的機器，就成為重要的工具，得以遂行殖民者城市發展之意圖。

綜上所述，孔廟在日治時期仍然是一個教育與文化的象徵，然而其位置是複

雜的，首先，早已經歷了鏡像階段的臺南市，已經將他者認同為自身，也就是將中國城市的理想形象，以及它所具有的一切文化內涵認同為自己，這是一種不疑有他的信仰固著，因而任何形式的外來文化介入，都顯得格格不入與唐突，1898年在這種情況下，台灣總督府發布了「公學校令」與「公學校規則」，於孔廟設立了「台南公學校」，1904年更名為「台南第一公學校」，對於日本政權來說，殖民者對於傳統、既有建築進行殖民式的轉化，讓孔廟這一傳統建築身負「教化」被殖民者的任務，也身負將台灣居民日本化的任務；而對於台南市民來說，孔廟這一傳統建築，在日本政權的改造工程下，成為了學習殖民者異國語言、接觸殖民者文化的教育中心。日治時期時，孔廟作為臺南傳統城市紋理的一部分，而被安置入近代城市街廓之中。對於臺南市民來說，臺南州廳如果象徵執政者與其外來文化，那孔廟就是代表著正受到衝擊的中華傳統與正統，相對於臺南州廳作為殖民者之象徵，孔廟則為被殖民者之代表，孔廟所乘載的文化背景，及其所表現的實質形式，都是令臺南市民感到親近、熟悉的，因此，它以一种相對柔和、理所當然的姿態，在台南市民心目中，毫無疑問的代表中華文化正統。

孔廟所原本內涵的儒家教育內容，在日治時期遭到殖民者的強行置換，而孔廟建築在此就如徒具空殼般的能指，對殖民者的教育目的進行力有未逮的指涉，它或有如漢奸一般苟且偷生，也像是被俘虜的戰敗者一樣，無法自主。可以說，孔廟這種複雜位置所顯示的，是一種包括臺南市民在內的，位於文化圈邊拓的島民、處於弱勢地位的族群，一種渴求完整文化系統支撐的欲望，因為由此才獲得安全感，然而他們在此卻失去選擇的權利，因為不完整、輪廓模糊的臺南市只能藉由對於更強大、更完整他者的服從與信仰才從中排解對於自己身體情況的焦慮。這種焦慮的暫時解除，是在1945年的中日政權更迭之際，而孔廟更身為「榮耀的勝利者」而現形。考量到臺南市所經歷的日治時期創傷性經驗，因此臺南市在1945年後透過各種舉動對於孔廟展現理所當然的認同，可以視作為一種創傷陰影下的典型反應，然而，這樣一種無條件的認同，很可能是一種逃避、視而不見、麻痺，它將造成臺南市本身傾向於對自己的匱乏視若無睹，甚至用各種方式企圖掩蓋，只呈現空虛而富麗堂皇的一面。

1970年代開始，台南市試圖以中華文化之傳承確立國民政府以及台南市的政治與文化正統性，孔廟、鄭成功等象徵中華文化的能指在此時期皆被大量操作：

「本市系文化古都，孔廟號稱「全台首學」，足證秉承中華文化，淵源久遠〔…〕。台南市為民族英雄鄭成功開府設治之地，擁有得天獨厚的文化遺產和觀光資源〔…〕。」(台南市政府，1985：34。)

這種反覆訴說其歷史、文化意義的舉動，本身就是一種再明顯不過的徵狀，這種徵狀對於國民政府來說，只表現了其對於自己外來者地位的焦慮；而對於臺南市來說，這種反覆的論述則連結了前已述及的臺南市對於自身所處位置的焦慮。

1997年起，這種焦慮以一種「歡樂」的方式呈現在城市中，「孔廟文化園區」開始進行規畫，是一個以孔廟為中心，漸次包含周遭的武德殿、永華宮、德化堂、延平郡王祠、鄭成功文物館、大南門、碑林與台南放送局等建築物的文化園區規劃。用文化資產保存的角度來說明這個現象的話，就是對於孔廟的古蹟保存，由點的保存，發展到整個區域的「面」的發展，以及特殊的形象營造。從市政府1997年始對於以孔廟開展的府城論述大加弘揚，以及孔廟由點的古蹟保存，到達如孔廟文化園區這般面狀的發展，從中可以觀察到的是一種實際上屬於空虛的麻痺工程，在城市中進行著，試圖催眠自己；這種現象的具體化，就是城市中的府城再造工程，也包括以孔廟為中心的復古造街。其後果在於，用一種空虛形式掩蓋自身不足，臺南市將離自己越來越遠，因為，臺南市本身的現實狀況，實則完全無法與這些中國語彙相應、對話。復古傾向的園區式發展，用一種歡樂、愉人的方式，掩蓋臺南市對自身認識的不足，顯露出臺南市對認識、建構自身的畏懼、怠惰，以及臺南市面對城市形象營造的潮流，如何展現自己「健全身體」的焦慮。問題是，孔廟所表徵的中華文化理想形象，對於臺南市從來都不是一個真實、健全的完整文化體系的象徵，而只是城市鏡像期中的幻象而已，由此，臺南市「府城再造」還可以看作是一種企圖回到過去的「返老還童」之舉，是對於鏡中幻象的執著與不斷的喃喃自語，從中所能得到的只是一種看似完整，實則遊蕩於夢境之中的麻痺與慰藉。透過孔廟所表現出的，臺南市想讓自己置身夢境的欲望，所透露的是對於探索自己陌生的破碎身體所感到的畏懼。

六、臺南市：一個藉由自殘認識/創造自己的藝術家

臺南州廳與孔廟，共同構成了臺南市源於近代創傷經驗的徵狀，是一種傷口的展現，這個傷口是由臺南州廳所表露的城市的疏離與對於自己身體原型認知上的缺乏，以及臺南市透過孔廟形塑幻想中的中華文化理型而進行的麻痺、慰藉之舉，所透露出的對自己陌生、破碎身體的恐懼所共同構成。由臺南市創傷經驗中所讀解的精神品質，就是臺南市對於自己身體的疏離、認知上的缺乏、以及對自己身體的畏懼。在這種精神品質下，臺南市面對發展的壓力，而展現出認識、建構自己的焦慮，它處處展現自己對歸屬感的渴望，然而也同時對自己施以麻痺，顯現出不願面對自己的畏懼，這是一種在「不斷發展」的前提下，卻處處「回歸歷史」的矛盾。因此，從城市環境營造的角度來說，這種由創傷處而生的精神品質，就以一種近似於精神分裂的方式具體化，由城市建築所表現，並在城市環境中全面展開。

也就是說，在近年來城際競爭日盛、城市形象營造潮流興起的時代背景下，臺南城市為了提升自己的城市形象，而對於原「府城」區域內不同歷史時期與政權之下產生的建築物進行突顯、再營造、賦予其新意義的過程，以及隨之而來的建築復古手段，具有一種近似於精神分裂的性質，它是一種臺南城市的建築徵狀，而以臺南州廳為核心的種種對於近代建築的保存、修護，以及突顯工程，相對於

以孔廟為核心的種種前近代的古蹟保存與再營造，還有「集兩者之大成」，蔓延於城市中的復古建築手段，就是這種精神分裂徵狀的具體展現。

這種徵狀企圖形構的，是一種源於創傷的整體想像，它是以「府城」為名的想像整體，而不是旨在對於昔日府城原貌、府城原初意境的重現工程，一種想像的「府城」，所統稱的就是前述的矛盾的城市工程，它是臺南市建築徵狀企圖達到的目標。這個名為「府城」的目標，是臺南市對於自己在複雜文化交錯下的發展史，所造成的混亂中，所提出的一種「解決」方案，一種對自己完整新形象的建構。這個工程藉由各種不同主題文化園區的計畫與建設，以及對各種古蹟、歷史建築的論述、突顯，使臺南市得以在對自己身體缺乏認知、畏懼觀看的情況下，以一種「再現傷口」的方式來認識自己、建構完整的自己，也就是說，在城市中以「作為傷口表徵的臺南州廳與孔廟」為基礎的，源於不同歷史時期、來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古蹟、歷史建築的修護、保存與再突顯工程，事實上是一種「傷口」的再現過程，企圖在城市中再現最初由臺南州廳與孔廟兩者所象徵的現代創傷，這是一種屬於臺南市的傷口再現工程。

由此，當代臺南市以「府城」作為臺南形象建構目標的發展方向，就具有了特殊的意義。雖然在當代臺南市眼中，府城是一個理想的形象，但它所代表的既不是臺南市，也不會是未來的臺南市，更不可能是對於他者，如中國、日本、荷蘭的典範效法與完整詮釋，而是一個在臺南市歷史發展過程中，所衍生的不屬於任何文化的陌生形象，也就是一個混種的新文化現象、整體。它看似對於臺南市所經歷過的各種不同文化內涵表示歡迎，然而，它想要「完善府城」的終極目標，在動機上就是對任何文化內涵表示拒斥的最佳表現，它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霸權，因為它想要大眾從一種「府城」形象的基礎上認識臺南的身體。不過在另一方面，它也代表了臺南市的「自剖」論述，因為臺南市不僅從中看見了自己的恐懼，還看見了它對自己身體的疏離之感，也看見了陌生的、四分五裂的自己；它不是臺南市，而是另一個整體，不過它卻是臺南市認識自己迄今的成果。作為建築之集合的臺南城市整體，現在就時時以一種「未完成的府城」的姿態，從那些由臺南州廳與孔廟兩者共同象徵的傷口中所生成的疏離、陌生、畏懼自身等精神內涵裡，表現出那些也體現城市居民精神中、源於臺南歷史的複雜情緒與精神狀態。

而對於一種源於臺南市發展史的創傷之再現，作為一種反覆出現的徵狀，它就是一種自殘的行為。因為要不斷的創造傷口，所以臺南市對自己的身體進行不斷的切割，以各個不同文化背景、緣於不同歷史時期的建築物為核心，劃分多個文化區塊，由此，傷口才得以在斷裂處、接合處顯現，此舉便猶如一種自殘舉動，在自己身體上劃下深淺不一的裂口，在這些裂口中，臺南市從城市環境中各種碎片與斷裂處的組合、拼貼與對細節處的觀看、細察，從傷口中認識自己，因為只有在碎片之中，才能夠對臺南市自己破碎不全、拼湊疊合的身體，從各種角度開展片斷的認識。至此，可以說，臺南市目前盛行的，建築的復古手段以及對於古蹟、歷史建築的突顯工程的建築現象，既是一種自殘的舉動，也是自殘的結果，而臺南市則是一個樂於自殘的藝術家，在自殘的過程中認識自己身體的每個部分，

並且逐步的建構自己的新形象。

參考文獻：

- 王國芳、郭本禹。1997。《拉岡》。臺北市：生智。
- 杜聲鋒。1988。《拉康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臺北市：遠流。
- 林耀盛、鞏卓軍。2009。〈我的傷口先於我存在？從創傷的精神分析術到倫理現象學作為本土心理治療的轉化〉，收錄於《應用心理研究》，第 41 期，頁 185-234。
- 范勝雄、陳柏森、黃彬、傅朝卿。2011。《舊建築新生命：從臺南州廳到國立臺灣文學館》。臺南市：臺灣文學館。
- 馬元龍。2006。《雅克·拉康：語言維度中的精神分析》。北京：東方出版社。
- 黃世孟。1987。《日據時期台灣都市計劃範型之研究》。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土木工程學研究所都市計劃研究室。
- 黃武達。1995。〈日治時代之臺南市近代都市計畫(一)-都市計畫之萌芽與展開-〉，收錄於《日治時代(1895-1945)臺灣近代都市計畫之研究論文集(二)》，頁 5-1—5-52。臺北縣板橋市：都市史研究室。
- 張一兵。2006。《不可能存在之真：拉康哲學映像》。北京：商務印書館。
- 傅朝卿。1998。《臺南市文化資產歷史名城》，頁 12-17。臺南市：南市文資協會。
- 趙珮伶。2007。《府城都市意象的文化再現與空間實踐：以孔廟文化園區為例》。國立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蔣素娥。2006。〈遇見潛意識——拉岡精神分析世界的語言作用〉，收錄於《濤聲學報》，民 95.03，頁 95-105。
- 劉紀蕙。2004。《心的變異：現代性的精神形式》。臺北市：麥田
- Dylan, Evans(狄倫·伊凡斯)。劉紀蕙、廖朝陽、黃宗慧、鞏卓軍譯。2009。《拉岡精神分析辭彙》(An Introductory Dictionary of Lacanian Psychoanalysis)。臺北市：巨流。
- Darian, Leader、Groves, Judy。鞏卓軍譯。1998。《拉岡》(Locan For Beginners)。臺北：立緒文化
- Freud, Sigmund(佛洛伊德)著，楊庸一譯。1975。《圖騰與禁忌》(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台北：志文出版社。
- ，劉平等譯。2000。《達文西對童年的回憶》(Eine Kindheitserinnerung des Leonardo da Vinci)。台北：米娜貝爾出版社。
- ，汪鳳炎、郭本禹等譯。2000。《精神分析新論》(Neue Folge der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台北：米娜貝爾出版社。

- ，張愛卿譯。2000。《精神分析引論》(*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台北：米娜貝爾出版社。
- ，孫名之譯。2010。《夢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台北：左岸文化。
- Harvey, Davi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Oxford: Blackwell
- James, Strachey. 1976. *The Standard Editi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 New York: W W Norton & Co Inc
- Julia, Kristeva. 1984. *Powers of Horror: An Essay on Abjection*.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 . 1986. *The Kristeva Reader*.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 Jameson, Fredric. 1992. *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 Late Capitalism*.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Lacan, Jacques(拉岡)著，褚孝泉譯。1996。《拉岡選集》。上海：三聯書局。
- Laplanche, J.、Pontalis, J.-B(拉普朗虛、彭大歷斯)。沈志中、王文基譯。2000。《精神分析詞彙》。台北：行人。
- Lechte, John(列區·約翰)。王志弘、劉亞蘭、郭貞伶譯。2000。《當代五十大師》(Fifty Key Contemporary : From structuralism to postmodernity)。臺北市：巨流。
- Soja, Edward. 2011.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New York : W.W.Norton & Co Inc

國科會補助計畫衍生研發成果推廣資料表

日期:2013/10/18

國科會補助計畫	計畫名稱: 城市徵狀: 精神分析式的建築閱讀
	計畫主持人: 郭建慧
	計畫編號: 101-2410-H-343-024- 學門領域: 建築與都市設計
無研發成果推廣資料	

101 年度專題研究計畫研究成果彙整表

計畫主持人：郭建慧		計畫編號：101-2410-H-343-024-					
計畫名稱：城市徵狀：精神分析式的建築閱讀							
成果項目		量化			單位	備註（質化說明：如數個計畫共同成果、成果列為該期刊之封面故事...等）	
		實際已達成數（被接受或已發表）	預期總達成數（含實際已達成數）	本計畫實際貢獻百分比			
國內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2	100%	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0%		
		研討會論文	0	0	0%		
		專書	0	0	0%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0%	件	
		權利金	0	0	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本國籍）	碩士生	0	2	100%	人次	
		博士生	0	0	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0%		
		專任助理	0	0	0%		
國外	論文著作	期刊論文	0	0	0%	篇	
		研究報告/技術報告	0	0	0%		
		研討會論文	0	0	0%		
		專書	0	0	0%		章/本
	專利	申請中件數	0	0	0%	件	
		已獲得件數	0	0	0%		
	技術移轉	件數	0	0	0%	件	
		權利金	0	0	0%	千元	
	參與計畫人力（外國籍）	碩士生	0	0	0%	人次	
		博士生	0	0	0%		
		博士後研究員	0	0	0%		
		專任助理	0	0	0%		

<p>其他成果 (無法以量化表達之成果如辦理學術活動、獲得獎項、重要國際合作、研究成果國際影響力及其他協助產業技術發展之具體效益事項等，請以文字敘述填列。)</p>	<p>無</p>
--	----------

	成果項目	量化	名稱或內容性質簡述
科 教 處 計 畫 加 填 項 目	測驗工具(含質性與量性)	0	
	課程/模組	0	
	電腦及網路系統或工具	0	
	教材	0	
	舉辦之活動/競賽	0	
	研討會/工作坊	0	
	電子報、網站	0	
	計畫成果推廣之參與(閱聽)人數	0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自評表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主要發現或其他有關價值等，作一綜合評估。

1. 請就研究內容與原計畫相符程度、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作一綜合評估

達成目標

未達成目標（請說明，以 100 字為限）

實驗失敗

因故實驗中斷

其他原因

說明：

2. 研究成果在學術期刊發表或申請專利等情形：

論文： 已發表 未發表之文稿 撰寫中 無

專利： 已獲得 申請中 無

技轉： 已技轉 洽談中 無

其他：（以 100 字為限）

3. 請依學術成就、技術創新、社會影響等方面，評估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簡要敘述成果所代表之意義、價值、影響或進一步發展之可能性）（以 500 字為限）

從跨領域的文化角度詮釋建築與都市發展的現象，企圖指出影響建築的無形社會力量，並增加建築論述對於建築美學的反省力，提供建築論述另一面向的建築視野。透過精神分析的面向，針對當代城市進行精神分析式的建築閱讀，及建築所表徵的精神品質。本計畫一方面分析文本的語言以及結構方式，整理出都市空間與建築的肌理，另一方面，研究居民心理閱讀城市地景過程和反應，探問建築符號造成負面徵狀的問題。